

□本期聚焦

4位信访干部的“生命答卷”

□新华社记者 张兴军 林 颀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小草，默默地传播绿色；他们像春风，不倦地送来暖意；“为党分忧、为民解难”是他们的职责；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是他们最大的追求。

2009年8月至10月间，河南省先后有4名信访干部病累交加，突发心脏病，倒在工作岗位上，由此引发对这一群体的广泛关注。

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毛成、李海景、李洪顺、王建立。

病逝

2009年8月20日夜，原阳县信访局局长毛成办公室。灯亮着，一沓文件摊开在办公桌上。他躺在桌后的简易床上，仿佛睡着了——就是在无数个深夜加班中的小憩一样。

一名工作人员走进来，提醒他时间太晚，该回家了。连喊三声，却没有应答。“也许，他睡得太熟了。”他想。随即走上前去，想把他叫醒，却发现自己握住的是一双冰凉的手。

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0点突发心脏病离世，在这浓缩生命的16个小时里，毛成像往日一样忙碌：召开信访协调会、接待上访群众、加班研究卷宗……

“他太忙了，也太累了，从早到晚就吃了两顿饭。”这名工作人员说，“感觉他就是去休息一下，从来没想到他真的就这样走了。”

奖杯和遗像摆放在一起——去世后4个月，南阳市信访局的李海景当选为2009“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

不到1米7的个头，将近85公斤的体重，不管多冷的天，都是羊毛衫外加一件半旧西装；常抽烟、骑自行车下访、吃方便面加班、外出聚餐抢着付钱……同事回忆出一幅“海景素描”。就是这位人称“铁疙瘩”的信访科长，却在不久之年倒在了工作岗位上。2009年9月15日，他加班到凌晨3点，第二天一大早，没吃早饭的他咬牙坚持上班。因为疼痛难忍，最终住进医院。在同事打来的慰问电话中，李海景扔下一句话：“我没事，别过来了，跟弟兄们说，要守好摊儿。”

这，竟成了他最后的遗言。上访群众找到家里，他热情接待。对妻子说：“这是我二哥，给倒杯水，我俩说点事。”

他的手机从不保密，是上访群众随打随通“热线”。

他就是回族信访干部——南乐县群众工作部部长李洪顺。

2009年10月21日晚，在接待完两批上访群众后，李洪顺回到家里，由于心脏病突发，51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得到消息后，上访群众代表抬着花圈到家吊唁。近德固乡王村农民王自和哭着说：“认识李部长两年多，每次他都喊我‘二哥’。他妻子可能现在都不知道，我这个‘二哥’是个上访的。”

这是一套仅有5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四面的墙皮已经脱落，斑驳得像是一幅幅地图。一辆折叠式童车停在客厅，是整个房间唯一的“亮色”。

童车的主人是个半周岁多的婴儿，躺在奶奶怀中，安逸而幸福。然而就在出生一个月前，她的爷爷——开封市信访局科员王建立去世了。

2009年9月7日，王建立像往常一样上班，在连续接待了两批群众后，头痛难耐的他请假去了医院。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笑脸

信访工作听到的往往是哭声、怨声，更有做不完的琐事、难事。记者广泛采访4位信访干部的同事、家人

和上访群众后，眼前渐次清晰的影像却是：4位信访干部时常面带笑容，乐观开朗，心平气和中不失幽默。

“经常是正在家吃饭或休息，忽然接个电话就走了，周末加班是常有的事。”原阳县信访局局长毛成的儿子毛长征回忆说，“听母亲说过，他夜里梦话说的都是信访的事。有些老上访户，全家人都叫得上名字。”

毛成11年信访局长的最后人生之路，密布着工作的脚步，连睡觉时也未轻松过。扫去路上时间的落叶，记者找到的却是他“快乐工作”的足迹。

“说了算，定了办，再大的困难也不变，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工作不完我不走。”在原阳县信访局，大家都对他的两句口头禅耳熟能详。

“虽然工作起来像‘拼命三部’，但是生活中的毛成却很幽默，平时爱讲笑话逗大家开心，有一套‘快乐工作法’。”原阳县信访局副局长李佰奇说。

“除了‘没架子’、‘办实事’外，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是：“毛书记性格开朗，能说会唱。”

60岁的西栗庄村支书吴道进介绍，早先农忙结束，村里到处都是闲人，“要么打牌要么打架”。为此，毛成自掏腰包500元，买了大鼓、高跷，帮助村里组建了文艺队。

“他会唱豫剧、曲剧，没事就组织大家表演，有时自己也登台。”吴道进说，“现在村里风清气爽，已多年没有上访的了。”

儿子毛长征回忆，日常生活中，毛成多才多艺，但因为太忙，实在没时间发展个人爱好。原阳县信访局的同志回忆，毛成的办公室里堆的都是书，从刑法、土地法到治安管理处罚法，只要跟信访有关的知识，他都用心吸收。时间长了，就被大家誉为“政策通”、“问不倒”。

经过摸索，毛成还创立了领导接待承诺制、县党政联席会议周例会制、村级矛盾纠纷调解员日排查报告制、信访工作代理制等。原阳县信访局副局长张清林说，这些机制的核心是及时发现诉求，倾听群众呼声，使矛盾纠纷及时发现在基层，化解在基层。

采访与毛成、李洪顺、李海景、王建立接触过的群众，他们描述的第一印象都是“很和气、很亲切”。讲述他们的事迹，仿佛谈论一位邻居或朋友，但每到尾声，总有人泪如雨下——他们一直觉得这些“亲人”还在身边，蓦然想到，已生死相隔。

南乐县群工部部长李洪顺的办公室是“一号信访接待室”，同事们经常见他和上访群众围坐着，谈笑风生。年岁大的，他喊哥嫂；年纪轻的，他称老弟老妹。

南乐县城关镇东关村支书杨周振是李洪顺的好朋友。一次他同李洪顺开玩笑：“真没发现，你当兵出身，还这么有耐心？找你的都是有气的，说话没好听的，当这个‘受气官’烦不烦？”李洪顺笑着说：“这是工作需要，没啥烦的，无非每天多喝二三壶开水。”

回忆起和李海景共事时的情景，南阳市信访局接访三科科长胡艳生感慨万千：“我是当兵出身，有点火爆脾气，一不注意就带到工作中。那时我俩办公室门挨门，只要一听到我这边起了高腔，他马上就过来批评我。在他面前，我永远是个新兵。”

忍忍

4名信访干部中，年龄最小的40岁，最大的也才55岁。他们从事信访工作少的只有两年多，多的近30年，但面对形形色色的上访群众，他们始终做到一张笑脸迎人、一杯热茶待人、一句贴心话暖人。而在这些忍耐和坚持背后，是春风化雨般的耐心，是常人看不到的精神层面的负重攀登。

55岁的开封市信访局科员王建立从事信

访工作近30年，是4位干部中“干信访”时间最长的一位，由此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接访艺术。

“老王，这事你帮俺拿个主意吧。”、“王大哥，俺有话想和你唠唠。”、“俺找王建立说，俺就信他。”在同事的记忆里，很多前来上访的群众常以这些话做“开场白”。

“他处理问题就像老中医看病，望闻问切，先了解来访意图，然后耐心解答，寻求解决办法。由于‘对症下药’，往往群众很信服。”开封市信访局副局长张柏松说，“他的办公室像个‘小集市’、‘接诊室’，信访群众一批批进，一批批出，他从不厌烦。”

长期的加班加点，王建立患上了胃病、高血压和心脏病，常年服药。每当有人劝他多休息时，王建立总说：“工作正需要的时候，我不能临阵退缩。”

南乐县群工部部长李洪顺去世的消息传开后，近德固乡王村农民王自和一边擦着簌簌而下的泪水，一边给群工部的同志打电话：“俺们上访的能不能来吊孝？”

王自和说：“他当群工部长只有两年多时间，我每年找他10多次，通电话数不清。他几次到我家看望，还当我的‘导访员’，陪我到省里了解政策。”

2009年6月，南乐县张虎屯乡张小陈村农民张长胜的妻子到宋古楼村一家诊所看病，打吊针时突然死亡。张长胜停尸不理，多次上访。

在多次协调拿出调解预案后，一个星期天，李洪顺通过张长胜的亲戚——南乐县城关镇东关村支书杨周振约他面谈。

张长胜怒气冲冲地来了，掀起衬衣，从腰间拿出一把斧子扔到桌上，暴躁地说：“我要跟他们拼命，媳妇没了，没啥过头了。”

李洪顺递烟倒水，心平气和地说：“长胜，拼命有啥用，你媳妇能活吗？这是犯罪，值得吗？”

回忆那时场景，杨周振泪流满面。他说：“看到张长胜那付孬样，我都烦。但那天他们从下午1点谈到晚上7点多，我等不及，外出办完两件事，回来见他俩还在聊。”

“这事解决了，我给你磕头。”快8点时，张长胜终于被说服了。

南乐县群工部办公室主任李永红说：“由于工作强度太大，很多时候我们都受不了，他却不以为然。常说：‘我在你们这个年龄，从来没喊过累。’”

2009年6月的一天，南乐县3个乡的100多名群众，租了4辆客车，要集体赴京上访，反映高速公路补偿低的问题。下午5点，李洪顺得到消息，迅速赶到群众集结地。

南乐县群工部副部长苏英杰回忆说：“群众坐在车上不下来，只答应派代表下车谈。从下午5点到第二天7点，李部长在车外站了14个小时。有些事代表同意，群众不同意，他就用电话同车上的群众沟通，挨个劝说。”

一些干部扛不起这个“疲劳战”，建议采取措施。李洪顺开导他们：“啥时不要对群众做亏心事，不要怕群众闹，就怕群众不找。”

经过20多轮反复，直到第二天下午3点，最终拿出了群众认可的解决方案。这22小时里，李洪顺眼没合一下。

南阳市信访局副局长李保灵这样评价李海景：“他做事有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只要是接到手的案子，一定会给上访人一个说法。”

因为土地纠纷问题，唐河县苍台镇的丁春显多年上访。为了摸清情况，李海景历时1年多，先后8次奔赴当地调查走访，直至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在同事眼里，原阳县信访局局长毛成也是一个“耐力十足”的人：由于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多年的老毛病强直性脊柱炎愈发严重，腰也越来越弯。

□热点透视

殡葬价格上涨为何这么快

——清明祭祀引发的话题

□新华社记者 叶建平 詹奕嘉 余 里 宋常青 菲 环

“清明时节雨纷纷，丧葬之人欲断魂。”又到清明，网络上流传的这段“顺口溜”，是人们对殡葬业暴利积怨的一种写照，殡葬价格上涨过快及背后存在的行业垄断已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记者日前就此问题在北京、甘肃、四川、广东等地进行了追踪调查。

部分墓地贵于房价，亡人感叹“死不起”

四川省成都市市民张先生的父亲不久前因病去世，想葬在龙泉驿区的长松寺公墓。可一打听价格，张先生大吃一惊：清明节推出的特价墓地都要3000元，最贵的要10多万元！“墓地价格比当地房价还贵！”

近年来，各地殡葬价格“水涨船高”。和张先生一样，一些百姓发出了“死不起”的心酸感慨。

4月1日，记者来到北京市福田公墓。价目表显示，公墓价格在7万元左右，最便宜的也要5.5万元，面积0.5平方米。左右的11万元，面积1平方米。价目表最后几页还附有豪华墓穴的介绍，但价格面议，工作人员称该业务已停办。

“最便宜就是5万多元的那种，但墓碑的材质和位置都不太好。现在还剩下几个，要的话就得快，过两天可能就没了。”工作人员反复叮嘱记者。据了解，5.5万元的价格只包括墓

碑、墓地20年的租赁费、管理费，刻字、绿化、花瓶等费用还需另外交纳，最终下葬总共需要6万元左右。

一名前来扫墓的北京市民告诉记者：“她父亲几年前过世，当时墓地才8000元，现在涨了很多倍。”

记者又来到北京市八宝山人民公墓，那里目前仅能办理老墓改造业务，新墓都已售完。“下次‘开盘’可能在五六月，但至少要七八万元！”一名业务员说。

公墓价格年年上涨，增加了百姓负担。在甘肃兰州，因为墓穴价格上涨过快等原因，一些市民违规修建土坟。

记者调查还发现，与墓穴价格上涨相似，殡葬用品价格也在攀升。在深圳市殡仪馆，绝大多数骨灰盒价位都在1000元以上，高的超过了4000元。在成都普安公所街，一家殡葬用品店主人指着两个黑檀木骨灰盒说：“我们只卖2000元，同样的骨灰盒在殡仪馆里要卖到6000元。”

行业垄断、暴利行为成为众矢之的

成都市民王先生最近刚为岳母办完丧事。谈起殡葬费用，王先生一肚子的苦水。“前几年，家里有个亲戚去世，才花了不到1万元。这次我办得简单，还花了近4万元，仅买墓地就用了两万多元。”

一名业内人士直言不讳：“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墓产商‘捂盘’及炒墓现象，殡葬

价格上涨是显而易见的。”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周伟说，墓地价格高低，主要取决三个因素，一是面积，二是风水，三是装饰。土地面积可以测算，但风水却无法用价格来度量。“墓穴是亲属表达追思的地方，价格高一些，也只能接受。”

“几十元成本的骨灰盒能卖到几百元，有的甚至数千元。”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胡光伟认为，这与殡葬行业主要由政府部门经营和管理有关，其垄断属性决定了他们拥有定价权。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殡仪服务单位3754个，其中殡仪馆1692个，民办机构不足两成；而民政部门直接管理的公墓1209个，殡葬管理单位853个。

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表示，殡葬行业确实存在某些垄断现象及暴利行为。虽有民营资本进入殡葬行业，但这个行业管办不分的格局仍未彻底打破。由于行业竞争不足，难免会带来服务和价格方面的问题。

刘润华表示，一些人认为殡葬行业价格虚高，是因为只看到殡仪服务盈利的部分，没有看到基本殡葬服务亏损的部分。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基本殡葬服务中，平均每具遗体处理费用为2738元，其中包括柴油、水电费等，实际收费400元，政府要亏2300多元。深圳一年大概有1.2万具遗体，一年亏损2800万元。怎么弥补亏损？一个重要的来

尤其是2009年以来，病痛常折磨得他整晚睡不着觉。妻子几次心痛落泪，劝他换个岗位，他却说：“党培养这么多年，不是让我当逃兵的。”

在平凡琐细的信访工作岗位上，4位信访干部不为人知的默默坚持着，他们用心中跳动的理想和敬业的火苗鼓励着自己，温暖着别人，发出的光亮，搭起一座座心灵的虹桥。

清贫

和工作中的表现、对待群众的热情相比，4位信访干部对待自己显得近乎“苛刻”，留给家人的也实在太少。

李海景的办公室至今仍保持原样。在靠窗的墙角，“029号接访员”的工作牌静静地挂在空荡荡的衣架上。办公桌上，一个大大的黄色茶缸格外显眼。紧靠另一面墙，摆着一张比例有点失调的长条桌。

在南阳市信访局，人人都知道“大茶缸”的故事：除了平时用来喝茶外，主要是在加班时泡方便面；而长条桌，就是李海景在熬夜时用来休息的“床”。

同事胡艳生回忆，日常生活中李海景非常节俭。最早的时候，他抽一块多一包的“群英会”，和上访群众换着抽，后来上访群众都不抽这种烟了，他才慢慢“升级”，但还是没过5块钱一包。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海景75岁的老母亲拿出一双打满了补丁的旧皮鞋流着泪说：“俺娃可节俭，上班才舍得穿好一点的鞋子，下班就赶紧换上这双旧鞋，我说啥没舍得烧掉，留下来教育孙子。”

和李海景相比，王建立的家庭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多年来，全家都住在其岳父留下的一处仅有5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没有像样的家具，甚至连取暖设施都没有；儿子、儿媳双双下岗。

王建立的独子王亚鹏告诉记者，现在全家主要依靠母亲每月千把块钱的退休金过活。

“刚开始下岗那阵，压力大，心里苦闷，特别想找他说说话。”王亚鹏说，“可他每天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时感觉待我还不如上访群众。”

由于妻子没有工作，家庭负担沉重，李海景生活拮据，一直没有自己的住房。但在忙碌的工作和清贫的生活中，他始终心怀乐观，并不忘帮助别人。

淅川县一名上访户生活困难，李海景毫不犹豫拿出400元钱资助；家乡修路，他一口气捐出6000元的积蓄；汶川大地震后，他还鼓励儿子，把从小到大积攒的500元压岁钱捐给了灾区。

李海景去世后，同事和家人整理遗物，发现了厚厚一摞荣誉证书。此外，在抽屉内还发现一张银行卡，上面仅有93元存款。

李海景的哥哥李海宪回忆说：“南阳有一个‘0377车友会助学活动’，但参与者都是‘有车一族’，李海景没有车，却一借借同乡罗桂兰之名参加活动，有时捐100元，有时只有30元、50元。”

南乐县群工部的同志们回忆，由于是回族，李洪顺基本不参加各种宴请活动，在清真饭店吃几个羊肉大包子，吃一碗烩面就是“好饭”。但上访群众来了，他经常自己花钱请吃饭，还不忘给群众要瓶酒。

尾声

“从来没见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仔细想想，许多细节却都很感人。”这是同事们对李海景的评价，也可以看作是这对4位已逝信访干部共同的评价。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他们没有耀眼的权力，只有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把信访群众当亲人，用生命履行使命；他们相继离开，但精神却如种子回归泥土，年年春风吹又生。

(据新华社电)

源就是殡仪服务收费。

减少殡葬支出，亟待公益回归

民政部近日下文，要求各地以减轻群众负担为出发点，逐步实现殡葬基本服务均等化。有关专家认为，要减少殡葬支出，需要进一步推进殡葬改革，通过完善立法，打破行业垄断，提倡绿色殡葬，促进行业回归公益。

刘润华说，消除殡葬暴利，打破行业垄断，必须做到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大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行业竞争，推进行业多元化发展。“最好是民政部门只提供基本殡葬服务，并对殡仪服务进行监督和管理，却并不参与殡仪服务。”

“正在修订中的《殡葬管理条例》值得期待。”周伟认为，只有通过立法明确政府在殡葬行业中的职责，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惩罚，才能构建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暴利行为。

针对“炒墓”、“捂墓”等现象，甘肃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智俊建议，引入社会监督，促进殡葬行业信息公开透明。公墓经营者拿地审批手续、价格等关键信息以及公墓的买卖状况都应及时分开，以压缩经营单位的价格“水分”。

刘润华说：“殡葬既是服务，也是消费。行业回归公益，一方面经济条件好的群众的需求要满足。另一方面，对困难群众要提供免费的殡葬服务。解决他们的亲人殡葬问题。”

减少殡葬支出，还应当提倡“厚养薄葬”的理念。胡光伟说：“现在有些人平时不孝顺，等到父母过世了，为了充门面、装孝道而铺张浪费。这种行为应该受到批评、遏制。”

据了解，深圳已成立由专家、网民等组成的殡葬用品招标采购小组，对丧葬用品按进货价加30%进行定价销售；成都今年为困难群众提供400多个免费的树葬、草葬、壁葬等“生态墓葬”。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记者 廖 君 魏梦佳

地处鄂西山区的保康县中坪村3000多位村民，为了开矿致富，不惜高息举债3000万元，委托一名“神通广大”的商人办理磷矿开采权证。没想到，这名商人用这笔钱买了三宗土地。

经过4年漫长诉讼，村民获得了胜诉。但法院方面的执行过程却一波三折，先是“找不到被执行人”，后是在“走程序”，日子一天天过去，村民无奈地等待，而破产与返贫的阴影正悄然袭来……

遭遇奸商，致富化为泡影

保康是湖北省扶贫开发重点县。1988年，中坪村成立了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坪磷化工有限公司，集中开发小水电和磷矿，村支部书记黄立杰兼任中坪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5年实现人均收入3000多元，一度摆脱了贫困。

中坪公司只有一座磷矿，年开采量15万吨，现有储量只够继续开采七八年，矿区水量也越来越少，小水电和磷矿都面临资源枯竭。申请新的磷矿开采权成为全村的头等大事。

2005年，商人雷化强找到村支书黄立杰，自称能帮中坪公司购买保康县白竹磷矿I号、II号矿段的采矿权，并办理好一切手续证件，价格为6000万元。

6000万元？对中坪村的村民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中坪公司也拿不出这么多钱。雷化强出了个“主意”：可以发动村民先筹资3000万元，由他到银行“存一贷二”，这样就可以变成6000万元。

3000万元也是大难题。黄立杰说，冲着采矿权，中坪公司找村民集资了100万元，又以一分五的月息找客户借债，最终集资3000万元。当年6月，中坪公司将这笔巨款交给了雷化强。

拿了钱，总得有个凭证。雷化强声称，“购买采矿权后国家会开具正式发票，我开具的白条收据不能记入集体公司账户”，拒绝给中坪公司出具收到钱款的证明。无奈之下，中坪村被迫同意在雷化强事先准备好的一份“借款”协议上签字盖章，勉强取得了雷化强的“借据”。

黄立杰说，签署借款协议并不是我们的真实意图，是被逼无奈的下策，如果不签，就连给他钱的凭证都拿不到。

拿到中坪公司的3000多万元，雷化强于2005年7月在襄樊市购置了三宗土地，并设立了襄樊市豪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又将三宗土地无偿转移到该公司名下。当年11月，中坪公司发现雷化强骗取资金用于自购地产后，开始追究被骗款项，雷化强则以种种理由拒绝还款。

中坪村的村民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致富梦想一夜之间化为泡影。湖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冯桂林研究员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任何一种交易活动都应合法依规运作，如果想通过不正当的途径或手段获取资源或利益，很容易像中坪公司这样上当受骗、得不偿失。

赢了官司，执行一拖再拖

为了讨回公道，索回巨款，村民拿起了法律武器。2006年1月2日，中坪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刑事调查。同时，为了防止雷化强以公司名义转移或变卖资产逃避，确保这笔巨款不受损失，又以民事诉讼方式，向襄樊市中院提起诉讼。

2008年5月，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雷化强败诉，雷化强不服中院判决，当年8月上诉到湖北省高院。省高院于2009年1月6日终审判决，“被告雷化强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5天内，返还中坪公司3000万元购矿款，并赔偿该款利息损失。”2009年5月，雷化强又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申请被驳回。

又让村民不明白的是，这样一起事实清楚的官司，为何雷化强能从襄樊一直告到北京，而法院方面执行判决却无计可施？尽管法律给了他们公正的判决，但要讨回血汗钱不知还要等待多少时间？

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员乔大林表示说，从2009年7月，法院方面就开始执行该案的终审判决，因为一直找不到雷化强本人，所有执行过程都要按程序履行，包括送达执行通知书、评估公告等，还需要公告两个月，直到今年3月25日，涉案土地才确定了评估单位。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乔大林说：“法院执行程序十分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他表示，涉及拍卖的相关事宜，执行局另有专人负责。至于何时了结此案，归还中坪村民的巨款，法院无法给出准确时间。

另一方面，中坪村的村民4年多来只能在还债中艰难度日。黄立杰说，因为还债，全村的生产经营已无法继续，每年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所需要的600多万元，因无力支付，现在全部被迫停止。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全村900多户农民停交养老保险费，去年退休的70多人没有领到养老保险，今年又增加了150人。

“正在走程序”，是黄立杰从法院得到的最多的答复。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新天说，法院所谓的“走程序”具有很大弹性尺度，是快是慢，法院方面有主动权。

“将公平正义及时送给百姓，应该是司法部门应尽的职责。”李新天说。

还债度日，面临返贫之忧

在中坪村的村民看来，雷化强是不折不扣的“骗子”，但法律并不支持这一说法。中坪公司代表律师罗彬告诉记者，本想通过刑事诉讼的方式，追究雷化强的刑事责任，促使尽快返还款项。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村民无奈之下签的一份借款合同，让雷化强的诈骗行为成了合法行为。

襄樊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杜文强说，雷化强虚构自己认识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厅领导的事实，以私下交易、办理采矿证为由，骗取了中坪公司的3000万元，但雷化强向中坪公司出具了借条，而且这3000万元用于雷化强个人在襄樊购买土地，只改变了资金用途，并没有改变资金的所有权，当时省市两级检察院经过几番讨论分析，最终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

由于高息借了2900万元的债务，中坪公司不得不将生产的大部分矿石用来还债，至今已偿还30万吨磷矿石，市场价值6000多万元，比当年的本金多了一倍。

55岁的村民李昌炳说，自打“受骗”后，大家都不敢消费，还担心生病，有的孩子上大学四处借钱。他说：“好像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64岁的村民李明廷告诉记者，他和老婆全靠一年近万元的养老金生活，去年自己患了胃病、肝炎，治疗花费3万多元，合作医疗报销50%，自己还要负担1万多元，因为无钱支付，只好高息借款。

面对村民的窘境，黄立杰懊悔不已。他说：“因为不懂法律，被人如此利用，不仅没找到致富途径，反而蒙受惨重损失。”对于如何讨回巨款，黄立杰说，如果真这样长时间拖下去，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村民破产与返贫。

专家指出，这起案件的表象是，农民被骗很无奈，法院执行很困难，而行骗者逍遥法外，但折射出的是，现阶段市场秩序不规范，法律制度不完善，公民风险意识不够强，这些问题亟待全社会正视与反思。

不能眼看着村民破产与返贫

湖北保康县中坪磷化工有限公司诉讼案件追踪

(据新华社电)